

通南巴平地下党斗争述略

王 超 易 伟

一提起地下党，就想起那黑暗恐怖的年代。

一提起地下党的斗争，就想起那艰苦险恶的岁月。

中共通、南、巴、平党组织的地下活动，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整整经历了十年！

漫长的十年！曲折的十年！党组织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人民群众由自发的无组织的反抗到在党的领导下自觉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由少数统战朋友到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形成广泛而巩固的统一战线。有如雨露融小溪，小溪涌大江，由大江汇成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在大巴山南麓，在巴河两岸，冲击着反动统治的基础，荡涤着黑暗社会的污浊，为配合全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通、南、巴、平地区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党组织的发展史，是一部同国民党反动派生死拚搏的斗争史，是一部运用统战法宝，战胜敌人，夺取革命胜利的统战史。这部丰富多彩的革命斗争历史，为当今及未来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极其有益的镜鉴。

本文试就建立化成革命据点、建立统一战线、建立奇章中学、建立中心县委、建立地下武装等五个方面，简要叙述通、南、巴、平地下党发展历史，粗略评说其斗争成败的经验教训。但因水平有限，史料不全，舛漏难免。望这部生动

激烈斗争历史的亲身参与者、知情者及其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不吝赐教。

建立化成革命据点

化成，是地下党秘密活动的据点，培育人材的摇篮，是通、南、巴、平群众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注1）

欲知化成革命据点之形成，先追溯其前因。

一九四〇年以前，通、南、巴（含今平昌，下同）党组织属阆中中心县委管，但党员极少。因为：

一九三五年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北上抗日时，苏维埃时期发展的党员，以及一九二七年巴中的兴文、清江一带，由苟寿南等领导的农民运动中所发展的党员，绝大多数跟随红军北上抗日，留下极少数党员，只能分散的个别的活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的清乡、迫害、残杀，有的牺牲，幸存者也只得被迫出走。

一九三六年以后，延安曾陆续派回一些党员到通、南、巴恢复工作，有的在途中被抓或遇难，有的回来，由于找不到党的组织和党员，又只有各自流散、隐蔽，不能开展工作。一九三九年下年，阆中中心县委接到党中央通知的前已派往通、南、巴的二十多个党员名单，示其寻找、联系。阆中中心县委书记王子模率巴中籍的党员吴显国（从延安派回阆中作地方与陕北联系的“交通”），以卖草鞋为名，到南江、巴中一带寻找了半月之久，一无所获。（注2）

红军北上时，在南江桃源留下了一支以刘子才、赵明恩为首的有三百多人枪的游击队，其中有不少党员。但是，由

于连续遭到反动派的“围剿”，敌我力量悬殊，由于军事策略上的失误，内部出了叛徒，因而导致全军覆没，刘子才、赵明恩均壮烈牺牲。

概言之，红军北上后数年间，党的活动和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酷地笼罩着整个通、南、巴。

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制造成都“抢米事件”，借机大肆抓人、杀人，镇压共产党，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阆中中心县委的交通机关出事，中心县委被迫疏散。川康特派王叙伍（王柏森）到阆中接替郝谦（任中心县委组织）的工作，派郝谦、伍级生（任中心县委交通）到通、南、巴进行组织联系。

六月，郝、伍在巴中同苟寿南（一九二五年入党，一九二七年巴中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此时在巴城以开设“活仁药房”行医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接通了关系。

七月，郝、伍在通江同肖中鼎（中共党员、潘文华部高参、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通江分会副主任）接通了关系。

在接通组织关系，了解地方情况之后，郝等回到阆中同饶茂文（中心县委领导成员）等相商，决定开辟通、南、巴的工作，认为：

- 1、通、南、巴是革命老根据地，经过战争年代和红军走后白色恐怖时期的严峻考验，群众基础好；
- 2、物产丰富，有良好的物质基础；
- 3、幅员辽阔，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开展地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条件优越；
- 4、边远地区，敌人军事力量薄弱，容易打开局面，站

稳脚跟，

5、通、南、巴已有一些党员在活动，有了工作基础，

6、肖中鼎常驻通江，他的公开身份很有威力，还带有一营武装，而且控制了巴、南两县的设计分会，通江可作为开辟工作的据点。（注3）

上述分析，乃符合实情之见解，因而工作的开辟，进行得颇为顺利。

肖以朋友关系把郝谦安排在通江县田赋管理处当录书。

郝谦、伍级生陆续从阆中、苍溪、南部转移了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二十多人到通江疏散隐蔽。

肖中鼎、郝谦商定开办工厂。肖在做好县长王蜀屏等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的基础上，以“发展实业，支援前线，抗日救亡”为号召，纳资集股，招收工人，时经三月，办起了两个纸厂、一个制墨厂、一个松烟厂，在通江城设了办事处，聘郝谦为秘书，伍级生任西河口纸厂管理员，阆、苍、南三县转移到通江的人员，大多当了工人，有的做小生意，开茶馆或栈房。

这样，为地下工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战场，为地下工作者取得了合法的身分，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九四〇年秋、冬就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麻石竹子坎支部，通江党组织开始恢复。

正当形势朝着预定计划迅速发展的时候，党内接连出了叛徒。为叛徒知情的和可能被怀疑的人员，都必须撤尽快离。因而所办的几个厂也相继解散，几十名正在觉醒的工人，也先后各奔前程（注4）。于是，辛辛苦苦开辟的革命据点，又只有痛心丢失。

回首追思：组织不纯，易出叛徒。加之，对阆、苍、南三县转移到通江的人员，审查不慎，在工作的开展中，组织联系控制不严，因而一出叛徒，损失面宽，危险性大，导致前功尽弃。应该说，这是通江革命据点丢失的根本教训。

由于通江据点的丢失，又只有转向新的战场——化成。

之所以选移化成，主要原因有三：

1、党组织在化成已有了赵济刚等可靠的统战朋友，他们拥有相当的势力和威望，党组织的负责人肖中鼎、郝谦、王叙伍已和赵建立了秘密联系（肖和赵还是师生和挚友），有了工作基础。

2、巴城已有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苟寿南以开设“活仁药房”行医卖药为掩护，一直在进行革命活动，上下城乡，联系方便可靠；

3、赵济刚建乡建学之宏愿，深得人心，因而急于征聘良师，促其事业之实现，这就提供了一个有利开展工作的立足扎根之所。

此外，这一带，地理条件优越，人民群众憨厚勤劳，经过苏维埃时期及其以后的阶级搏斗。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要求，可谓“地利人和”。

一九四一年七月，川北工委派王叙伍到通江，传达“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由肖中鼎写信将王介绍给赵济刚协助办学。王和赵见面后，赵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欢迎共产党！”（注5）。此时此地，此情此境，赵能表达此心此意，是难能可贵的。这充分说明，他同党组织及肖中鼎的亲密关系和他的思想境界。

王叙伍同赵济刚、米玉竹（又名米崇昆，时任化城乡乡

长，赵之亲密合作者，党的统战朋友）等，在年初以来的建校筹备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计划，多方努力，由王具体负责建校施工及有关教学业务准备，仅两月时间，将化成街上的文昌宫改建成了学校，一切就绪。秋，化成乡中心小学正式成立，并随之开学行课。米玉竹兼校长，王叙伍任教务主任。开学前后两三月内，先后有郝谦、伍级生、李荫谷（王叙伍之爱人）经组织安排到校任教。

从此，化成小学成了共产党人立足扎根之所。

一九四一年秋，化小“兴家立业”，到一九四三年秋，已是“满门桃李”。教学业务正规，学校风气良好，群众关系密切，“学校声誉斐然，远道学生，恳请入学”（注6）。郝谦在校内石柱上写的一副对联，充分表现了当时学校的景象和共产党人的欣喜之情：

炳炳磷磷万里河山归旧主；

融融蔼蔼满门桃李属春风。

但这一时期，遵照党的“十六字”方针精神，暂不搞组织发展，任务是“勤学、勤业、勤交友”。对学生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为组织发展打好思想基础。

一九四三年秋，王叙伍离化成去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川北工委派王朴庵以教师身份到化成接替工作。从此，对学生逐步转入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课堂内外，批改作业，以提高学识为主，巧妙灌输共产主义思想，进行理想和前途教育。对学生普遍进行观察、了解、分析之后，抓住重点学生，进行重点辅导培养，个别谈心，通过半年多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九四四年上年，就有人要求入党（注7）。

至此，从立足到扎根，从开花到结果，化成革命据点牢

固地形成了。

建立统一战线

毛泽东同志讲过：“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党组织自始至终正确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充分发挥这个法宝的威力，建立、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壮大自己的力量，瓦解反动营垒，战胜敌人，夺取胜利。在这一方面，通南巴平党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贡献，对当今的四化建设，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的。

通南巴平地下党的统战代表人物是赵济刚。以他为代表的党的统战力量，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一九五〇年三月，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同志到巴中视察，在干部大会上讲话时特别指出：“通南巴平地下党组织，立足十年之久，没有受到损失，全国是少有的，赵济刚有很大的功劳……”（注8）。耀邦同志对赵济刚于革命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

地下党的统一战线形成于四十年代初期，但赵济刚和党的关系却从三十年代开始。

赵济刚在任新场民团督办期间，与军阀田頌尧、县团练局长李庄发生冲突，“两下斗争，数场恶战，败逃巴山，被迫参军，以图生存”（注9）。在川军四十四军李伯阶部任过上尉参谋、连长、少校团副、中校参谋、营长等职。在达县参加该部军事讲习所学习时，结识了该所教育长、进步军

人肖中鼎（后系中共党员），既是师生，又是挚友，肖之思想言行，对于赵之倾向革命，有极其重要的启蒙作用。

一九三八年冬，赵济刚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时，“得晤周（恩来）、叶（剑英）、李（煮）、边（章伍）诸先生，他们均属和蔼可亲，热心教育，……品性学识以及诚召于我者，又的确是吾人导师。中华民国的确要这样做去，才有办法，才有出路，才得光明，才得胜利。……周、叶、李、边诸先生平易近人，使我倾心崇拜，瞻仰难忘，尤其离别数日，为最难忍失，绕屋傍徨，心中忐忑，俨若赤子失去慈母”（注10）。

此次受训，是赵济刚奠定革命思想基础，初步认识中国共产党以及后来欣然接受党与之建立统战关系的起点。

之后，“参加随枣战役，扼大洪山一带地区，发动游击，暗联新四军之江汉纵队，互为策应，牵制敌人，使敌人不敢长驱直入”（注11）。秘密配合新四军之举，标志着赵济刚思想倾向的重大变化。不久，因战斗负伤，转后方治疗。

赵在万县养伤期间，肖中鼎（已是中共党员，任万县第九行政督察区保安副司令）去看望赵。赵对国民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大骂国民党祸国殃民。肖借此鼓励赵回乡建乡建学，干出一番事业。赵济刚于一九三九年冬回到了家乡化成。

一九四〇年三月，肖中鼎已是潘文华部少将参军，负责作潘部上层的统战工作，任通江绥靖设计分会副主任。赴任时，途经巴中，特地看望赵济刚，并与之促膝畅谈国家安危，时局兴衰，抗日救亡之道，详商建乡建学之计，为化成革命

据点的开辟创造了条件，为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地下党人，自始至终抓住了这三个环节，发展统一战线，巩固统一战线，扩大统一战线。

当时，巴中政局复杂，派系斗争激烈。

以红胡子李庄为首的老派，控制党、政、军、财、教等方面的大权，左右巴中政局二十多年，上下城乡拥有势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动顽固的堡垒，这是地下党的最大障碍。

以黑胡子赵济刚为首的新派，虽属新兴力量，但人数较少，羽翼未丰。团结进步势力，支持进步势力，发展进步势力，这是地下党的迫切任务。

以白胡子叶良一及李子犹为首的军官派（均当过国军旅长），他们已弃武还乡，解甲求闲，只有空自嗟叹时局，深感失意而已。虽无职权，但有能量，政治态度，处于中立。其中也有人曾作过有愧于人民的事，但此时已却步收手，静观时局。这是地下党应当大力争取的中间势力。

党组织基于上述分析，狠抓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三个环节”，把发展、巩固、扩大统一战线融贯于整个工作和斗争之中。

化成小学的建立，也即是革命据点建立的头几年，地下党人切实致力于贯彻实施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任务，尽力团结学校中一些有事业心的

教职员，忠于职责，勤于事业，认真教书，对学生亲如手足，关怀备至，亲切对待家长，密切社会联系，言行严谨，处处为人师表。无论是教师品行，课程设置，教学质量，师生关系，学校同家长和社会关系，校纪校风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赞扬。业绩的好坏，是能否取得社会信任的标准。社会的信任，是地下党人立足扎根的关键，业绩和信任，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对于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着极其特殊的推动作用。

王叙伍、郝谦、王朴庵的组织关系，赵济刚是明确的。因而，他们可以“开门见山”给赵讲马列主义，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讲《共产党宣言》，讲党的方针政策，讲中国的前途，讲个人的前途，讲怎样发展进步势力，讲怎样建设新巴中。一句话，党组织对赵济刚，不断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政策、时势、前途的宣传，使其逐步加深对共产党的认识，不断坚定其革命意志，不断巩固他和党组织的关系。

随着建乡建学的业绩卓著，赵济刚的地位和声望也随之提高，以赵济刚为代表的包括米崇昆等地方进步权绅人物在内的统一战线，也随之逐步形成。

化成革命据点巩固了，工作局面打开了，统一战线建立了，但党组织认为：仅囿于此，还不能适应组织的发展，阵地的延伸，以及派系斗争和控制政局的需要。因此，党组织和赵济刚共商，支持米崇昆利用上层关系进入了县教育科，接着任了督学，进入了县选举办公室主办选举工作，一九四七年担任了县政府助理秘书（实际代行秘书职权）。这就为掩护党的活动，进一步开展各个方面的工作，创造了一个极其优越的条件。

一九四六年实行选举，党组织经过周密计划，细致安排，充分发挥米崇昆在选举办公室的作用，作好各区、乡头面人物的工作。并发动奇章中学的学生，以选民身分，深入各地，串连亲友，争取群众。选举结果，赵济刚当上了县参议长。不久，又进入县党部当了监察委员。一九四八年，又当上了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县长兼总队长，实乃挂名）。赵济刚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左右巴中政局的大权在握，以他为代表的进步势力的阵营形成了，反动顽固的老派势力彻底崩溃了。统一战线随之而巩固和扩大，掩护力量随之而加强，为党组织的大发展，为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提供了极其可靠的保证。

十年间，赵济刚、米崇昆等与党组织心心相印，互相支持，风雨同舟，为党为民立下了大功，下面择其概要而述之：

一九四二年夏天，化小开办刚一年，就已风誉山乡。也因此而招来一些猜测和议论。南坝场一些地头蛇在茶馆公开说：“郝谦他们这样有学问，为啥到这山旮旯里来教书？图个啥？他们不是汉奸，也是共老二！”赵济刚得知后，当面训斥舆论者：“他们是我请来的老师，郝老师还是我的干亲家，你们给老子放明白点，再胡说，就脱不倒手！”及时将这种危险舆论弹压下去（注12）

一九四三年秋，国民党重庆行辕密令：“查奸匪王陌生（应是王柏森）借教书为名，在化成一带有异党活动，仰该乡乡长米崇昆立即捉拿归案，切切此令。”米得此县府转来之密令后，急与赵商量对策。抓住名字之误，以“查无此人”为借口，敷衍过去。

一九四四年，化成小学一反动教师支使一学生画了一幅画：一颗大树下坐着一个渔翁在池塘边钓鱼。并在学生中煽动：大树是赵济刚，渔翁是王朴庵；王利用赵这颗大树，引诱学生上钩。党组织发觉势头不妙，与赵相商，抓住此教师与学生喝酒赌钱，挑拨师生关系之把柄，发动学生进行揭露后，赵将这个教师逐出了学校，拔掉了一个钉子。

一九四八年冬，特务张维真（化小校长）、何援民（奇章中学总务）秘拟了三十六个地下党员名单，上报特务机关，国民党重庆行辕密令县长林翼如限期逮捕归案。米崇昆获悉后，及时转告了赵永嘉（地下党员，赵济刚之子），党组织及时进行了分散部署，避免了损失。

一九四九年春，县自卫总队住清江的二中队队长杨××到处缉捕地下党员杨安，借机抓了二十多个“嫌疑分子”；拴打吊押，敲诈勒索。赵济刚得知后，担心暴露党员，伤害群众，立即将杨×掉换，将二中队调往化成，由赵之旧友，化成乡乡长黄贵廉兼任中队长，及时制止了敌人对党组织的破坏。

由于化小、奇中的声誉逐步扩大，地下党活动的逐步深入，群众运动的逐步开展，加之，被派遣到小学、奇中监视地下党活动的特务的密报，县党部事前不通知，搞突然袭击，借检查学校为名，探查地下党的线索。但一出发，米崇昆就给化成打电话，叫“准备迎接”。由于一切安排周到细密，未露蛛丝马迹，检查大员们只有夸赞学校“办得好”！

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心县委委员何静修代表党组织与赵济刚商谈迎接解放的有关事宜，讲明革命形势，党的政策之

后，赵济刚态度明朗，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一切听从党的指挥，议定了和平解放巴中的各项事宜，对通、南、巴、平四县的和平解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党组织把统战工作扩大到通、南、平各县，并深入到四县区乡广泛地发展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如知识分子，开明绅士，以至国民党军政人员中那些不愿再跟国民党反动派走下去的人。采取各种方式，广交朋友，与他们建立关系和感情，对他们进行争取教育和帮助，给他们以信任支持。着眼上层，争取下层，使他们站在人民解放事业一边，以进一步扩大统战范围。

按照中心县委的统一部署，各级党组织，作了大量艰巨而又细致的统战工作，争取了很多上层人物。如通江的王翼民、司瑞，南江的周阳春、翁恒明，平昌的赵光宇、杨正武、陈朋等党政军的头面人物或知识分子，还有四县区、乡保的一大批地方权绅人士。他们在掩护党的活动，支持群众“三抗”斗争，提供敌情，资助棉花、银元、金银首饰交给党组织购买武器，建立地下武装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起过重要作用。

对那些气焰嚣张，反动顽固的分子，则采取了警告，孤立和打击的策略，使之规规矩矩，减少阻碍和破坏，为迎接解放扫除障碍。

事实雄辩地证明：在十年漫长的岁月里，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得以立足生根，发展壮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得以轰轰烈烈的顺利进行，直至全面胜利迎接解放，除主要的成功因素外，统一战线的力量，是有其特殊功劳

的！

建立奇章中学

办学，是党组织借以开展地下活动的独特方式。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培养人才，是社会的需要，是山区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化成小学，由建立到发展，化成革命据点，由形成到巩固，地下党人由立足到扎根，这一时期，是革命事业艰难困苦初创时期，是基础奠定的时期。

一九四五年底已有六个高小班毕业，共两百多人，已发展党员十多人，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但是，仅办小学而不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小学两年，时间太短，毕业之后，有的升学走了，有的回到了农村；而且小学阶段，学生年龄一般较小，这对党组织培养发展党员，形成较为稳定的骨干队伍极为不利。同时，小学毕业后到外地升学的一些学生，深感校纪校风，师生关系，教学方法等等不如母校那样在精神上、思想上、知识上得到满足，纷纷回到母校，要求补习初中课程。一九四五年下年开办了一个中学补习班，经过一期初中课程的补习，效果很好，影响很大，要求参加补习班的更多，仅此权宜之计，是不能满足学生和家長之要求的。加之，“赵济刚也想给他培养人才，增强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事业”（注13），仅办小学是远远不相适应的。于是，客观形势和主观愿望，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创办中学！

经党组织负责人王朴庵向川北工委汇报得到同意和支持之后，与赵济刚反复磋商，由赵和米崇昆（时任清江督学）出面，联络化成、清江、中兴、花溪、玲云、兴文、曾口等七个乡的头面人物，积极筹备。但对于校址和校名，几次筹备会，都有争论，因涉及建校基金，各乡学生就近入学的便利等问题。最后选定古代曾设过县而且位置居于各乡之中的奇章坝，并取“奇章”之义，命名为“奇章中学”。因化成已具有校舍、教师、学生、班级等各方面的良好基础，校址暂设化成，待奇章坝新建校舍后，再行搬迁。但由于诸多原因，一直没有搬迁。

为了使奇章中学有地位，有影响，更有利于党的活动，党组织同赵济刚相商，荐举了资格老、声望高的国民党省党部视察员董铸仁（玲云乡人）任名誉校长，赵济刚任校董会董事长，米崇昆任副董事长，各乡均确定一名当权人士为董事。地下党负责人王朴庵代理校长兼任训育主任，郝谦任教务主任。一九四六年春，奇章中学正式开学。中一班学生四十多人，除个别已是党员外，大多数是“补习班”经过党组织挑选、培养、教育的积极分子。

校内的组织机构，别具一格。学生寝室，高小、初中各班级，设有市长、乡长、保长、乡民代表和乡民主席等职，貌似灰色，实际是以此为掩护，各级组织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

这样，学校内从上到下的一切权力，都是由地下党组织在掌握。

奇章中学创办后，对学生的教育内容，更加广泛和深刻了。课堂教学，大量地向学生巧妙灌输是与非、正直与邪

恶、光明与黑暗、阶级关系、剥削关系等道理。如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句，给学生解释为“劳心者吃人劳力者拿给人家吃”（注14），以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课外活动，组织了秘密读书会，由党员教师领导一些党员或经过党组织挑选、审查过的学生学习《大众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新华日报》、《延安半月刊》

《联共（布）党史》和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学校图书馆（由学生党员负责），专门给进步学生借阅革命的进步书籍。音乐课大量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山那边是个好地方》等革命的进步的歌曲。假期组织文艺宣传队、篮球队，让学生广泛联系社会，进行革命实践。对重点学生，进行课外个别辅导，个别谈心，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党纲党章的教育。

总而言之，对广大学生，因时因人，采用各种方式，因势利导，以提高其思想觉悟，培养积极分子，适时地发展党员。

奇中开校后，至一九四八年秋，上级又陆续派了中共党员艾文、林树人、刘黎平、李力勤、魏文引、何静修、陈敏、陈忠理以及川大进步学生黄南涛（一九四九年春入党），到校任教，从事党的工作。艾文任小学部主任。一九四八年秋，王朴庵离巴后，林树人任奇中代理校长。

一九四八年秋，党组织为了扩大阵地，加速组织发展，深入开展群众运动，亦为了平衡因奇中校址而引起的各种矛盾，党组织与赵济刚商量，在清江增设一个奇章中学清江分班，招生50名。党组织从化成转去五名学生党员，以他们为骨干，迅速发展组织，到一九四九年这个班发展党员十多

人，建立了党支部。

奇章中学的建立，为党的地下活动和组织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原川北工委负责人王叙伍回忆：“从一九四一年到解放，化成小学、奇章中学，表面看是赵济刚办的，其实是我们党在办，应该说是我们的党校”（注15）。

教育事业的发展，掩护了党组织的发展，地下斗争的深入，促进了教育事业的欣欣向荣，学校声望的提高，也增添了赵济刚等人的豪情壮志。

赵济刚为奇章中学的成立撰写了一副对联，寄托了他的愿望：

时局正需材愿诸生胞与惟怀莫贪恋一楼风月；
物候偏惊我忆早岁钓游此地曾饱看四面云山（注16）。
米崇昆也曾以联附之，表达了他的心情：
兴学校以挽颓风民可化俗可成愧我未偿三乐愿，
储英才期作霖雨孝于家忠于国树人已奠百年基。
（注17）。

县长胡国成也撰一联镌于校门：

顶天立地赖长材，置千间广厦传经，新簇簇，一园春色
满门桃李；

继往开来需善士，兴百代文风固本，暖烘烘，三更灯火
四壁图书。（注18）

建立中心县委

化成小学的开办与发展，是化成革命据点的建立与巩固